

法国的中国新移民人口构成分析

——以传统、制度与市场为视角

李明欢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通过分析法国的中国新移民人口数据可以发现, 浙江、福建、辽宁三个地域性社群移民人口构成, 显示出不同的地域特色。浙江移民群, 性别均衡, 平均年龄轻, 但总体年龄跨度大; 福建移民群, 以年轻男性移民构成移民人口主体; 而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移民群, 则以中年女性构成移民人口主体。地域传统的路径依赖关系、国家制度政策的规制性力量以及市场需求关系的绩效原则, 共同构建了三种地域性移民模式的差异格局。

关键词: 中国新移民; 法国; 传统制度与市场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 0460(2008)03- 0106- 08

在欧洲, 法国是最早出现中国移民群体的国家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源源进入法国, 法国华人社会人口总量持续攀升, 最新数据显示, 法国华侨华人人口总数已经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不足 3000 人, 猛增到大约 45 万人, 其规模在欧洲各国中高居首位。^①

由于法国移民政策的严格限制, 大批不符合法国移民接纳条件的中国新移民是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进入法国的。非正式跨国移民分布零散, 具有相当的隐密性, 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社会群体, 因此, 如何获取可靠而详实的人口统计数据始终是相关研究的瓶颈。

笔者通过多年在巴黎的追踪调研, 获得了一个包含两万多名巴黎中国新移民的数据库。本文通过对该数据的分析, 揭示浙江、福建、辽宁三个地缘性社群移民人口构成的不同特征, 进而通过对移民传统、制度政策及市场因素的综合解读, 探讨制约移民人口构成模式的内在因素。

一、资料与研究方法

国内关于法国华人社会的研究不多。法国华人原居地以浙江为主, 因此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

* 收稿日期: 2008- 02- 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达国家移民政策比较研究”(04BMZ015)

作者简介: 李明欢, 女, 广东汕头人,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学博士。

① 关于法国华侨华人人口总数的统计各有不同。此处依据的是在法国出版的《欧洲时报》2003 年 9 月 27 日报道的数字。

这一地缘群体。笔者于2002年出版的《欧洲华侨华人史》一书,对20世纪末叶之前法国华人社会形成、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追溯。(李明欢,2002)法国学者廖遇常(Live Yu-Sion)、马蒙(Ma Mung)在其追溯中国人移民法国历史、分析法国华人社会经济生活的文章中,主要介绍了浙江人移民法国的历史过程以及目前在法国的生存状况,并对浙江人的拼搏精神给予基本正面的评价。(廖遇常,1994;廖遇常、陈旦生,1991;马蒙,1994)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浙江人”王春光博士于1999年到巴黎,与当地的温州移民一起“搭铺”生活了四个月,回国后发表了《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及相关文章,他依据“移入一定居一适应”的全过程,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黎温州新移民的“跨社会建构”问题。(王春光,2000)

关于欧洲福建人的研究则以2004年由四位欧洲学者联名出版的英文专著《跨国华人:福建移民在欧洲》为代表,该书首次将欧洲的“福建移民问题”提上学术探讨层面,将“当代福建移民问题”置于中欧关系的大背景下,分析“一群希望靠自身的力量寻找就业机会、赚钱致富”福建人如何通过合法与不合法的手段,冲破国家控制,进入欧洲谋生立业。由于该研究在欧洲的主要调查地为英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因此基本不涉及法国。(Frank Pieke et al, 2004)

至于在法东北新移民,相关资料更少。法国的“东北人”是以负面形象开始进入当地人视野的。2000年初,法国中、法文媒体相继报道“巴黎街头出现中国大陆卖淫女”,并指出这是一批来自中国东北的“下岗女工”,在法华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①同年5月,法国“语言文化辅导协会”会长马克·保罗(Marc Paul)在参加关于欧洲中国新移民问题研讨会时,向会议提交了《东北人:巴黎的中国新移民》,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文章虽然简单,但毕竟是第一次在学术会议上正式提出“巴黎的东北人”问题。(Marc Paul, 2002)笔者在《欧洲华侨华人史》一书中虽然也提及在欧洲出现的中国新移民中的新的地域群体,但因为资料所限,只提出“北方人”“正在成为欧洲华人社会关注的一个新问题”。2006年,日本学者王维与香港学者钱江共同发表了美国旧金山湾区《中国东北新移民》的调查报告,该文的长处是结合实例对该群体的迁移背景、社会网络、非制度性资源配置等不同层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及理论探讨;但不足之处是该文仅以一男一女两个访谈个案为分析样本。(王维、钱江,2006)

本文力图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新移民人口构成为切入点,解读影响移民构成的内在因素。笔者自2001年以来,对法国移民政策及中国新移民问题进行了多年的跟踪调研,与法国非政府组织“语言文化辅导协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本文所依据的新移民资料,即源自该会所建立的数据库。^②

法国“语言文化辅导协会”由法国人马克·保罗先生(Marc Paul)在1996年发起成立,并担任会长。该会的创会宗旨是向以中国人为主的巴黎新移民提供学习法语、了解法国生活环境的服务。由于工作卓有成效,自1999年3月起,该会获得巴黎警察局特许,可以用协会名义为巴黎的“无证”新移民提供“地址担保”。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特许权,因为,尚未获得在巴黎长期居留权的“无证”新移民,凭手上的有效证件(原居地的护照、身份证或有效公证材料等),即可到该会进行注册登记,得到一个“合法地址”,用于与家人通信联络,或向法国的银行、邮政、医疗、移民等相关机构申办各类手续。由于拥有这一特许权,从1999年3月到2004年8月1日,共有约2.7万名新移民到该会登记。^③在郑重承诺仅将相关资料用于学术研究之后,会长删去相关登记资料中有关个人姓名、在

① 具体情况请参阅《如何看待巴黎的华人妓女》,《鸣镛》2000年第1期;《法国新闻媒体眼中的华人》,《欧洲时报》2001年1月3日;《巴黎卖淫女中出现中国人》,《欧洲时报》2003年9月27日;《东北阻街女进军巴黎之后》,《商务周刊》2002年第18期,等。

② 笔者感谢巴黎应第七大学盖哈西莫夫博士(Eric Guenassimoff)邀请本人参加其所主持的“巴黎华人”研究项目,并提供了多次到巴黎进行实地调研的机会。

③ 按规定,该会不接受16岁及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登记。

法临时居住地址、联系电话等隐私资料后,让笔者拷贝了记录有 2.7 万新移民基本资料的数据库。

在巴黎期间,笔者一直主动担任“语言文化辅导协会”的义工,接待上门求助的新移民,并陪同他们前往相关部门办理医疗保险、银行开户等个人事务。通过直接接触,并征得对方同意,共对巴黎的无证中国新移民做了 34 例比较正式的个案访谈,同时还做了大量的现场随机交谈,着重了解其迁移动因、迁移方式以及在法国的生存状况。同时,笔者还走访巴黎当地政府相关机构、巴黎警方和移民局官员,访问巴黎主要的华文媒体及华人社团组织,从不同侧面了解中国新移民在法国社会的生存状况,分析存在问题及政策走向。

总之,“语言文化辅导协会”所提供的新移民数据库和笔者本人所做大约 6 万字的访谈记录,构成本文的基本资料基础。

二、地缘、性别与年龄:新移民人口构成特点

由法国“语言文化辅导协会”提供数据库的总计登记数为 26 950 人,除去无效、^①重复及非中国人的登记条目外,^②数据库中一共保存了 20 586 名中国新移民的登记资料。以下是依据来源地、性别、年龄等不同要素进行分项统计的结果。^③

首先,从新移民人口的省籍分布看,其基本特点可以总结为:大集中、广分布。“大集中”即来自传统侨乡浙江的移民仍然高居榜首,占 58.5%。“广分布”则表现为进入法国的中国新移民已经遍布除台湾省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再进一步分析,则可以看到在法中国新移民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态:第一阶梯是浙江省;其次是福建省,占 11.3%;再者是辽宁省,占 9.8%。必须指出的是,因为法国华人习惯于将来自辽宁、山东、天津、吉林、黑龙江等地操“北方话”的新移民统称为“东北人”,因此,包括上述五省市新移民在内的“东北人”总计达 4 453 人,占总人数的 21.6%,而来自其他 23 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新移民加在一起,仅占总人数的 3.5% (详见表 1)。

进一步的分析还显示,各省新移民在省内的来源地也同样显示出“大集中”的态势。浙江省新移民主要集中于浙江省的传统侨乡瑞安、温州、青田、文成等。其中来自瑞安县的新移民占浙江省总人数的 40.3%,其余依次为温州、青田、永嘉等。而占浙江省新移民总人数 3.8% 的人口,根据其本人的登记,则分别来自舟山、余

表 1 在 ASLC 登记的中国新移民人数
(按所登记的省籍划分)

省、直辖市、自治区	总人数	%	
浙江	12 038	58.5	
福建	2318	11.3	
辽宁	2018	9.8	21.6
山东	1210	5.9	
天津	606	2.9	
杏林	468	2.3	
黑龙江	151	0.7	
上海	1043	5.1	
其他各省市自治区 ^④	734	3.5	
总计	20 586	100.00	

① 有的条目原先仅有姓名及备注,无其他内容。因为姓名及备注部分在数据库提交给笔者时已经删去,所以部分条目成为空白的无效条目。

② 从登记材料中可以发现,在该会登记并寻求帮助支持的还包括来自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等国的新移民。

③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罗春霞老师协助对数据库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分析、制表,特此致谢。

④ 来自其他省市自治区的新移民人数包括:广西 96,广东 93,江苏 92,河南 81,河北 70,江西 58,四川 39,湖南 38,北京 35,湖北 34,安徽 27,山西 21,新疆 10,贵州 7,云南 7,甘肃 5,内蒙古 5,海南 4,重庆 4,青海 3,香港 3,宁夏 1,西藏 1。

姚、杭州、台州、安吉、洞头、奉化、嘉兴、金华、丽水、宁波、平阳、绍兴、泰顺、萧山、义乌等大约 60 个不同县市地区(详见表 2)。

福建省新移民的地区分布也呈现相似状况。来自福清、莆田两个相邻地区的新移民占福建新移民总数的 85.5%，其余则分别来自长乐、明溪、福州、连江、平潭、永春、永定、上杭、泰宁、长汀、永泰、龙岩、闽侯、建宁、将乐、南平等 40 多个县市(详见表 3)。

表 2 浙江省新移民主要来源地

来源地	人数	比例(%)	比例(%)
瑞安	4850	40.3	80.3
温州	3271	7.2	
青田	1538	12.8	
永嘉	1015	8.4	19.7
文成	560	4.7	
瓯海	208	1.7	
乐清	133	1.1	
其他县市	463	3.8	
总计	12 038	100.0	100.0

表 3 福建省新移民主要来源地

来源地	人数	比例(%)	比例(%)
福清	1071	46.3	85.5
莆田	908	39.2	
长乐	56	2.4	14.5
明溪	46	2.0	
福州	37	1.6	
连江	28	1.2	
其他县市	169	7.3	
总计	2315	100.0	

辽宁省新移民主要来自沈阳、抚顺两市，占总人数 67.3%，其余则遍及铁岭、鞍山、丹东、辽阳、开原、大连、本溪、阜新、锦州、营口、凤城、辽中等 50 多个县市地区(详见表 4)。

就性别构成而言，以上三大主要地缘群体显示了三种不同的性别构成模式：浙江男女比例基本持平(51%: 48.9%)；福建以男性占绝对多数(75.7%: 24.3%)；而辽宁则正好相反，以女性占三分之二以上(详见表 5)。三省新移民人口构成形成明显差异(详见图 1)。

就新移民的年龄构成而言，以浙江新移民年龄构成最年轻，福建次之，而以辽宁新移民年龄

表 4 辽宁省新移民主要来源地

来源地	人数	比例(%)	比例(%)
沈阳	935	46.3	67.3
抚顺	423	21.0	
铁岭	197	9.8	32.8
鞍山	98	4.9	
丹东	86	4.3	
辽阳	43	2.1	
开原	45	2.2	
其他县市	191	9.5	
总计	2018	100.1	100.1

表 5 浙江、福建、辽宁三省在法新移民性别结构

省份	女		男		空缺 人数	总计
	人数	%	人数	%		
浙江	5890	48.9	6145	51.0	3	12 038
福建	560	24.3	1749	75.7		2309
辽宁	1390	68.9	628	31.1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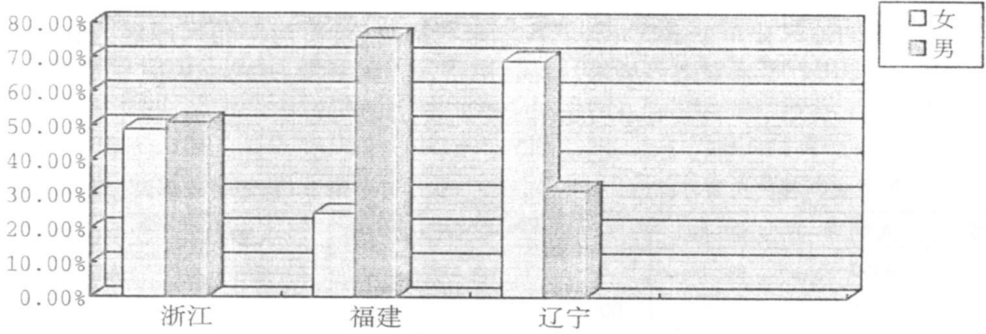


图1 浙江、福建、辽宁三省在法新移民性别结构图

构成最高。具体言之,浙江新移民的90%集中于17岁到40岁年龄段,男女无明显差异,年龄中位数是28。福建新移民87%集中于21岁至40岁,90%的女性和80%的男性86%集中于这一年龄段,全体年龄中位数是30。而在辽宁新移民中,80%集中于31岁到45岁年龄段,女性的82%、男性的74%集中于这一年龄段,全体年龄中位数达到37,女性群体的年龄中位数更高过男性,达到38。

新移民年龄构成的另一特点是总体年龄跨度。其中,浙江移民群的年龄跨度最大。由于“语言文化辅导协会”只接受17岁以上的新移民进行登记,因此,浙江、福建最低年龄都是17岁。但在整个数据库中,55岁以上共179人,其中150人来自浙江,男性年龄最高78岁,女性最高73岁。如此高龄还通过非正规途径移民法国,令人关注(详见表6、图2、图3、图4)。

表6 浙江、福建、辽宁三省在法新移民年龄构成

省份	年龄中位数			最大年龄		最小年龄	
	全体	男性	女性	男	女	男	女
浙江省	28	28	28	78	73	17	17
福建省	30	31	29	57	47	17	17
辽宁省	37	36	38	59	55	20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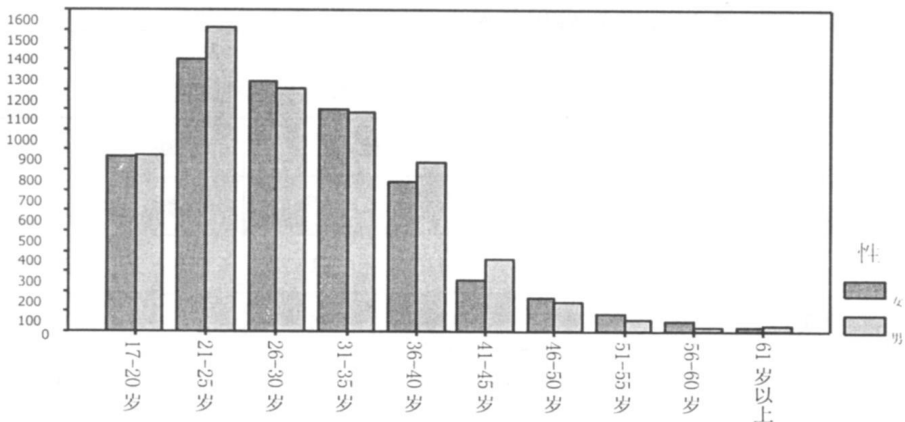


图2 浙江省新移民年龄、性别构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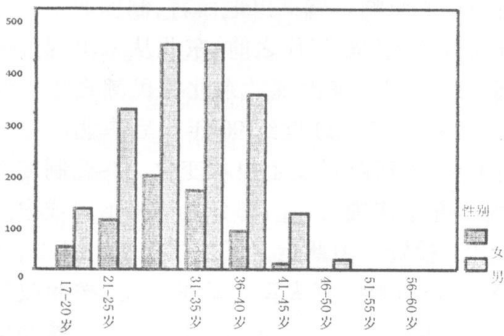


图3 福建省新移民年龄、性别构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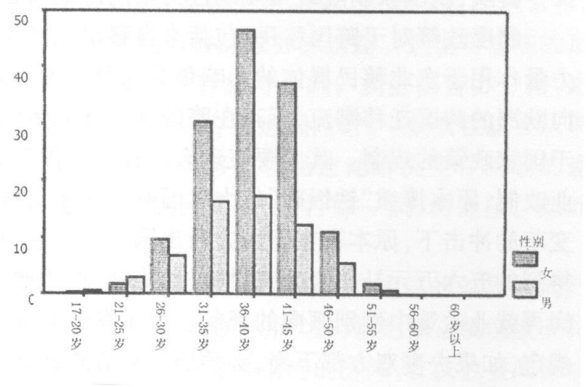


图4 辽宁省新移民年龄、性别构成图

三、传统、制度与市场: 移民构成模式剖析

从以上对新移民人口数据的基本分析中可以看出,浙江、福建、辽宁三省新移民在人口构成上显示出不同的地域特色:浙江移民群性别均衡、平均年龄轻,但总体年龄跨度大;福建移民群以年轻男性移民构成移民人口主体;而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移民群则以中年女性构成移民人口主体。

形成如此明显地域性差异的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地域性传统的路径依赖关系、国家制度政策的规制性力量以及市场需求关系的绩效原则,共同构建了三种地域性移民模式的差异格局。

首先,就地域移民传统的路径依赖关系而言。

浙江温州、青田地区朝向法国等西欧国家的移民潮迄今延续上百年,业已在当地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地方小传统,因此,对这些地区的潜在移民而言,他们自幼就在耳濡目染中受到移民文化的熏陶,走上移民之路似乎理所当然。而且,在移民过程中,既可从亲朋好友那里获得迁移信息,又可指望一定的经济支持乃至抵达后的居住安置及就业安排。这种“协助”无论是基于亲情,或是融亲情与市场交易为一体,均为司空见惯。由于浙江移民在欧洲多从家庭式的小餐馆、小加工厂起步,以一家老少的相互帮助为基础,男女老少都能在这种家庭式的经营中各得其所,即便是老年人,也能为子女看家、带小孩或打理家务。因此,浙江移民既在数量上占据主体,又呈现出男女老少共同移民、且总体年龄跨度大的态势。

福建省也是传统侨乡,其向东南亚迁移的历史远比浙江人移民欧洲要早得多。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福建人跨境迁移的主要方向最先以日本、美国为主,欧洲是在90年代后才逐渐凸显为又一迁移的目的地。由于福建移民基本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低,也没有什么专门技术,因此无论是到美国或日本,多进入底层打工。福建人的特点是对出国后可能面临的困境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对于苦活累活不太计较,一门心思赚钱。一位被访的福建人对此直言不讳:“在日本的同乡为赚钱连死人都背,我在法国不错了,没什么可抱怨的。”在如此行为背后,其实是福建侨乡那种“爱拼才会赢”、“今日出国吃苦,来日衣锦还乡”之传统信念的主导。而且,正因为知道要吃苦受累,福建历史上以单身男性下南洋闯天下、女性留守家乡的传统也就在向欧洲开拓新的移民地域时,继续延续。^①

① 笔者在拙著《福建侨乡调查》的《结语:解读福建侨乡》中,从海疆文化、边缘文化、底层文化、跨界文化四个层面,对福建侨乡文化进行了解读。

其次,就国家制度政策规制性力量的影响而言。

制度政策对于跨国移民,包括来自移出地和移入地的双重影响。就移出地而言,制度的规制性力量作用于东北移民群体的影响最为明显。可以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东北从未出现过朝向欧洲的跨国迁移潮流,不存在跨国谋发展的传统,因此,近十多年来出现的东北移民潮直接受制于国家政策的规制。其主要表现有二:其一,国有企业改制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东北国有企业改制,原本捧惯“铁饭碗”的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推向市场,生活路径发生根本变化。在此制度性变革的冲击下,原本存在于南方的出国谋生之风,在东北引起了连锁反应。部分人员将下岗或内退得到的五六万元补偿金,一次性付给中介,作为改变命运的“投资”,由此走上了出国之路。其二,下岗再就业政策中性别倾向的规制。由于东北有许多夫妻双方同为国有大型企业的职工,按照政策规定,如果夫妻双方都下岗,必须照顾一方重新就业,而这一照顾大多给了男方。因为,一来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男性被认为理应承担养家职责;二来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中,三四十岁的男性如果不太计较的话,还比较可能重新找到工作。结果,大批中年女性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后果的直接承受者。这一背景成为东北出国人流中以中年女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一大制度性因素。

就移入国而言。法国的移民政策一直处于调整之中,但总体趋势:一是人道主义的主导地位尚未被完全动摇,家庭团聚、难民接纳等人道主义通道继续存留;二是加强对独立移民申请人专业、技能、年龄、语言等方面的考核与选择。(李明欢、卡琳娜·盖哈西莫夫,2003)在如此制度政策的规制下,浙江人除了充分用足其亲缘纽带的作用外,还表现在收养、联姻等真真假假的“无亲造亲”的非正规操作中。前面提及的浙江55岁以上的老年移民群,主要是去帮助忙于立业的子女打理家务,因为法国担心太多老年人来分享其社会福利,所以大多允许父母来法探视子女,却不允许其长期居留,结果许多老龄父母在入法签证过期后成为留居巴黎的“非正规移民”。

东北情况则又有所不同。东北大型国有企业原先名声较大,因此,当20世纪90年代东北人开始走上出国之途时,他们办理签证比“南方人”要方便得多,许多90年代出国的东北人是以原国有企业雇员的身份,通过考察、旅游、商务、留学等合法途径出国的。一位辽宁女性被访者说得十分形象:“去办商务考察签证那天,我风衣一披,拎包一拿,派头十足,签证官一看就给签证了。哪像那些福建、浙江农民,缩头缩脑,一看就是偷渡客。”能够率先走出国门的东北女性,相当一部分表现得十分独立、泼辣,敢做敢为。而且,在大方接受笔者访谈的东北女性中,离异出国者不在少数,她们明确表示:到法国就是想再嫁一次,拼一下。这一群体特点也直接影响到她们在法国的职业选择。

再次,市场需求关系绩效原则的影响。

在三个群体中,以浙江人在法国的人脉最好,环环相扣的乡缘网络使浙江新移民能够比较快地进入由先期移民之乡亲所建立的餐馆、皮件加工厂、制衣厂或批发店打工。而且,由于浙江温州地区民营经济发达,小商品市场活跃,因此,一些有经济头脑的温州新移民还通过移民延伸本乡本土的生产销售链条,从进出口批发贸易中获取最大绩效,走上跨国致富之路。

福建虽然民营经济也比较发达,但因为其主要集中于闽南,而法国的福建人主要来自福清、莆田等地,与闽南人存在方言、文化上的隔阂。而且,在法国的福建人还缺乏在当地的网络,因此往往只能从给浙江人打工起步。因为福建人能吃苦,单身青年男性又不介意奔波于法国比较偏僻的外省边远地区,做那些浙江人自己不愿干的杂活,因此大多倒也能较快地找到打工赚钱的机会,适应市场需求并从中获益。当如此信息反馈回家乡后,自然也就延续了同一类型的连锁迁移模式。

相对而言,东北人进入法国市场的困难最大。由于他们来自城市,原先多有比较体面的工作,打心底瞧不起那些“浙江农民”,然而,在法国的现实环境中,他们人到中年,既缺乏能够为法国市场所需要的特殊技能,又不懂法语,结果只能给浙江人打工,有的被访女性甚至是到那些自己都没有合法身份的浙江人家中当保姆,可以想见其心理落差有多大。而且,无论是在浙江人的工厂打工,

还是在浙江人家中当保姆,由于大多东北人没有合法身份,只能接受低工资,加班加点更是常事。在此过程中,一些不愿给浙江人打工的东北女性,就走上了从事特殊服务的道路。这也与法国的市场需求相关。一些法国人生性浪漫,对东方文化、东方女性有一种猎奇心态。据法国警方介绍,来自东北的中国女性比较大方、外向、主动,受法国男性欢迎。当生存遭遇困难时,一些女性就去从事“按摩”或直接“站街”从事性服务,因为这对她们而言,是唯一能够比较迅速地解决生存问题的途径。而且,的确也有些人由此而有了与法国人直接接触的机会,实现了“再嫁一次”的愿望。如此“成功”例证则又转化为制约东北人移民途径的因素。

综上所述,正是传统、制度与市场三重因素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对移民人口构成的差异格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非正规移民群的总体特点是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缺乏按正规制度安排获得上升流动的机会,故而可能采用特殊的非正规路径去突破制度和结构的屏障,在灰色空间探求发展,希冀获得命运的改变。这是剖析法国中国新移民人口构成及其影响因素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李明欢,2002,《欧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李明欢、卡琳娜·盖哈西莫夫,2003,《“共和模式”的困境:法国移民政策研究》,《欧洲研究》第4期。

廖遇常,1994,《法国华人一百年:1900年以来的华人生活》(中法文双语本),巴黎:法国共忆协会出版。

廖遇常、陈旦生,1991,《法国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历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

马蒙,1994,《法国华人社会概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4期。

王春光,2000,《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王维、钱江,2006,《移民网络、社会资源配置与中国东北新移民:美国旧金山湾区田野调查札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

Frank Pieke, Pal Nyiri, Mette Thuno & Antonella Ceccagno, 2004, *Transnational Chinese: 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c Paul, 2002, “The Dongbei: the new Chinese immigration in Paris”, *Globalizing Chinese Migration: Trends in Europe and Asia*, edited by Pal Nyiri & Igor Saveliev,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责任编辑:陈双燕]

Tradition, Institution and Market: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France

LI Ming-huan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the population data of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France, the author pictures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three groups on the basis of their original province in China. Zhejiang immigrants have appeared as a young group and its sex ratio is almost balanced. Fujian immigrants are dominated by young males. And the immigrants from Northeast China have appeared as a mid aged female dominated group. The differences have been resulted from the three reasons: the tradition of the patrilineal reliance; the governance of state institution and the efficient influence of the labour market.

Key words: new Chinese immigrants, Franc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 and market